

中国近代中资银行的发展与变迁

◎武岩 刘春红

摘要：中国近代中资银行诞生在剧烈动荡的岁月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36年，中资银行已占有81%的国内市场份额，随后受战争影响，中资银行的发展陷入停滞。本文系统梳理了近代中资银行的变迁过程，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资银行，分析了中资银行业务经营情况，最后勾勒民族银行家群像。

关键词：近代；中资银行；变迁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银行业诞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乱世里交织着近代中资银行的兴衰沉浮，以及民族银行家们的进取和无奈。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实施良治的政府，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近代中国最缺乏的，而中资银行在上下求索的艰难历程中完成了历史使命。按照资金来源，近代中国的现代银行包括三类：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①、中资银行。其中中资银行又分为官办银行、官商合办银行、商办银行（又称私营银行或私人银行）。

一、近代中资银行产生的背景

（一）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曾三分天下，后均逐渐走向衰落

1845年，英资丽如银行在香港开设分行，这是

中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随后欧俄日美等国银行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到19世纪末，外资银行与票号、钱庄等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票号垄断了国内汇款业务，钱庄主导着中国商人的融资，外资银行主要为从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外商融资。正如杨荫溥（1930）指出：“外资银行、票号、钱庄鼎足而立，各有其特有地位。洋商之事，外资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业任之；埠与埠间，省与省间之联络，则非如票号之分号遍布，臂指相联者，决不能胜其任。”

票号是通过参与清政府的汇款业务发展起来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现代新式银行的设立，使传统的票号业务受到冲击，但保守的票号总部却屡次拒绝改组为现代银行。过度依赖官方业务又固步自封，盈利的表象掩盖了潜在危机，清政府的灭亡最终使票号退出历史舞台。

钱庄在民间有比较深厚的工商业根基，大多数中国商人都依赖钱庄融资。得益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钱庄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顶峰，但随后的进一步扩张受到了中资银行的挑战，这一过程中很多钱庄改组为现代银行。

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拥有诸多特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反帝运动使其大量倒闭或歇业，外资银行开始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各国实力，加上中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总资力^②的比例从1894年的32%下跌至1936年的10%。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外资银行仅10余家。

作者简介：武岩，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春红，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

① 中外合资银行市场份额和影响力都较小，大多数经营不成功，且常为外资控制，有的文献将之归为外资银行一类，因此本文不单独论述。

② 资力指资本实力，包括银行资本、存款和发钞量之和。

（二）大量资金需求和谋求经济独立发展催生了中资银行

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发展现代民族工业的重要性。建立现代工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钱庄和票号资本非常有限。保守的票号习惯了汇款业务优势带来的利润，不愿拓展新业务和新客户。19世纪末的大部分钱庄只有几万两白银的资本，为扩展更多业务，越来越依赖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资金，因此钱庄只能向商人提供短期贷款，无法提供发展工业需要的长期贷款。外资银行本就被中国国际贸易的增长吸引而来，更偏好为国际贸易融资和向清政府贷款实现快速获利，加上对中国企业不熟悉，因此不愿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长期发展冒险。这就为中资银行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建立中国自己的银行成为当务之急。

外资银行将现代银行经营方式引入中国，客观上助推了中国现代银行的出现，但也一度控制了中国金融命脉。一是垄断外汇市场。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长期在中国外汇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据此操纵外汇市场。中国对外贸易成交额和款项调拨约有80%通过上海，而汇丰银行买卖外汇的数额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外汇牌价由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确定，中国偿还外债和支付债息需要购买外汇时，经常面对不利的外汇兑换率。二是掌握财政命脉。1900年《银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税收，盐、关两税最巨，合计有两万万余元，此巨额款项悉为外人所经收，以其偿债之余数发还中国政府，故有关余、盐余特殊之名称，中央财政命脉已寄于外国银行之手”。

洋务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在1894年的《盛世危言》中写道：“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而维大局……中国钱庄资本二万三，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洋务运动的著名实业家、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深感如果没有银行的巨额资金支持，很难发展大型

工业企业。他在1896年请设银行的奏折中提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二、近代中资银行的发展变迁

中国近代中资银行萌生于19世纪末，1912—1927年快速发展，1927—1937年进入扩张期，到1936年，占有了81%的国内市场份额（见图1）。而后，随着国民政府对金融业的垄断，加上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中资银行发展受阻。

（一）中资银行崭露头角（清末民初：1897—19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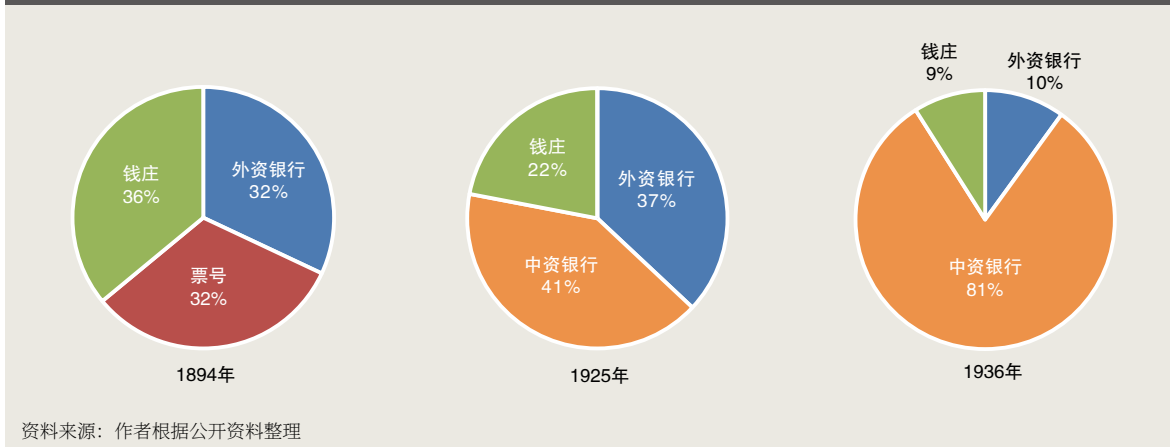
1. 官办和官商合办为主

从1897年第一家中国通商银行设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有17家中资银行开业，其中有11家是政府创办。到1911年，有官方背景的剩4家，私人银行3家。

1897年5月，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开业，开启了中国银行业的新纪元。中国通商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初始实收资本250万银元，最大股东是招商局，持股80万银元，盛宣怀为第二大股东，持股73万银元，其余股东多为官僚和商人，股东限定只能是中国人。该行管理仿效汇丰银行，章程中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则……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并聘请原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英国人美德伦为洋大班，上海钱业董事陈淦为华大班。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国的铁路、航运、电报、钢铁、纺织等现代企业提供贷款，并向钱庄和外商提供贷款。该行最初几年业务发展迅速，但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原因在于，实际经营中未能如盛宣怀所愿，各地分行管理者多由各地候补道台担任，既缺乏专业知识又官气十足。中国通商银行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破坏中受损，加上1903年日本伪造该行纸币导致信誉下降，以及业务策略上看重官方汇款而轻视公众存款造成资金来源不足，1936年在国民政府金融垄断改革中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1952年^①，

^① 本文论述历史的时间截至1949年，但出于完整叙述的考虑，会介绍中国近代一些重要的中资银行结业情况，时间可能会跨越到1949年之后。

图1 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市场结构变迁



中国通商银行和其他 59 家私营银行、钱庄及信托公司一起改组为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①。

内忧外患的时局迫使清政府推出更多改革。1905 年，清政府成立了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1908 年改名为大清银行；1912 年又改组为中国银行。1908 年，邮传部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

2. 商办银行出现

1906 年，中国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纯私人中资银行——信成银行在上海成立，由曾做过清政府顾问的实业家周舜卿和后来参与辛亥革命的商人沈缙云发起创办。初始实收资本 50 万银元，都是民间商股。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重视储蓄的商业银行，存续时间只有 8 年，却有不少创新。信成银行十分重视吸收民间小额存款，是中国第一家一元开户的银行。“凡有洋银满一元以上，不论多寡，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均可存储生息”。改变了当时银行只为有钱人服务的观念，开创了中资银行小额存款的先河。但因将大笔资金用来资助辛亥革命，出现严重亏损，1913 年停业。

1907 年，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主要股东是浙江铁路公司，占股三分之一，其他股东是来自浙江、上海、汉口的商人。最初主要是为解决浙铁

公司募集的铁路股款存放问题，辛亥革命后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南三行”之一。

1908 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成立，由宁波帮商人筹建，“四明”取自宁波的四明山。初始实收资本 75 万银元。最初几年由于照搬钱庄管理模式，经营不善而亏损，后经孙衡甫大力改革，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实力渐强。该行重视储蓄，设立了四明储蓄会。并侧重房地产投资，除经营用地外，在上海兴建了大批里弄房屋。1937 年，被国民政府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1952 年加入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这三家商办银行的资本实力远弱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但开启了中国商办银行的重要发展历程。

3. 中资银行声誉渐起

在清末的几次金融危机中，中资银行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声誉越来越高，逐渐成为中国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对象。例如，1908 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人们担心政局不稳，纷纷从钱庄和票号提现，外资银行又突然减少对钱庄的拆借，导致许多票号和钱庄破产。为阻止局势恶化，大清银行、交通银行、

① 1950 年私营银行、钱庄等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1951 年全国绝大部分银行、钱庄在国家银行领导下先后实行联营经营：
 (1) 新华、实业、四明、通商、建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源源长、浙江第一银行成立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
 (2) 盐业、金城、大陆、中南、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五家银行成立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
 (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久安信托成立公私合营上海银行联合管理委员会；
 (4) 中孚、中信、垦业、中华劝业、茂华等 14 家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成立了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
 (5) 永亨商业、上海女子、中国信托、顺康钱庄等 28 家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成立第二联营总管理处。
 1952 年 12 月，除侨资私营银行外，全部私营行庄五个系统共 60 家银行、钱庄、信托公司改造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设在北京。1955 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当地人民银行。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向钱庄、票号提供了大量贷款。大清银行作为担保人，请户部拨款向钱庄和票号提供贷款。这些贷款让诸多金融机构免于破产。

（二）中资银行快速发展（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

1. 中资银行雨后春笋般出现

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外环境都有利于中资银行发展。1914年一战爆发，国内外市场需求骤增，中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1914—1925年成立的工业企业数量是1840—1911年成立的工业企业数量的1.7倍，年均投资额是前者的11倍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轻工业，尤以棉纺工业发展最快。由此催生的金融需求促使中资银行雨后春笋般出现。1912—1927年，共有186家新银行开业，虽然倒闭的有135家，但蓬勃发展的势头不减。1927年中资银行的存款、贷款和总资产都是1911年的8倍多，资本增长速度是4倍多。

这一时期，商业银行中出现了著名的“北四行”“南三行”。“北四行”是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南三行”是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加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九家中资银行。这些银行积极创新，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但中资银行的扩张受到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局势的严重制约。为免受内战的影响，大多数中资银行将机构限制在大城市或租界内。1925年年底，超过三分之二的中资银行分布在前十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天津。近一半的银行总部设在这些城市，这限制了其经营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

2. 商办银行大量创设

中资银行出现之初，多有政府投资或支持。到1915年年底，47%的中资银行及其72%的实收资本属于官商合办。官方背景给这些银行带来了许多优势，但由于政局多变，军阀混战等原因，加上官方控制和权力滥用常使这些银行陷入困境，挤兑倒闭、停业清理的年年有增长。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军阀常把这些银行当成发动战争的金库，敲诈勒索和腐败使诸多官方银行经营困难或破产，商人不愿投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武力强迫商人出资合办银行。

即便如此，依然难以筹到充足的启动资金，官办银行越来越不受欢迎。由于军阀的政治腐败和财政问题，1916年和1921年出现两次挤兑风潮，对官办银行的发展造成重大冲击。1925年年底，官办银行数量占中资银行的比例降至1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商办银行快速发展，其信用越来越被市场认可。这一时期新设的银行超过80%是私人组建的，实收资本远超官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

3. 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开启私有化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商股比重大幅上升。1916年的“抗停兑令”事件中，中国银行坚守独立性声誉鹊起，交通银行则被北洋政府的“交通系”严格控制遵照执行而遭受重创。为减轻政府权力滥用的损害，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和交通银行的钱永铭都致力于私有化改革。1917年，中国银行推出了新《中国银行则例》，增加商股比重，摆脱政府对管理人员的控制。1924年，中国银行的商股已增至99.75%。1927年，交通银行的商股增至99%。一些省级官办银行也开始了私有化过程。例如，1923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股和商股分离，分设为完全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完全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

（三）中资银行进入扩张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

1. 中资银行经营质量和数量明显提升

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政治统一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近代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国银行业不仅在数量和实力上较北洋政府时期更强，同时经营情况也更加稳定，倒闭数明显下降。近代中资银行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扩张，经营业绩比之前有了很大提升。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中分析，1928—1937年中资银行“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零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见表1）。

这一时期，中资银行的资本实力增长了400%以上。外资银行和钱庄的资本实力只略有增长，

表1 1897—1937年中资银行设立、停业情况

年份	总行数量(家)		
	新设银行数	停业数	实存数
1897—1911	17	10	7(1911年)
1912—1927	186	135	58(1927年)
1928—1937	137	31	164(1937年)
年月不明者	50	50	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数据整理

1936年分别为9.1亿元和7.58亿元，远低于中资银行。1936年，中资银行已拥有81%的资本实力，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些中资银行努力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工商业贷款成为重要业务，重要的中资银行开始向农村提供贷款（见表2）。

2. 南京国民政府控制银行体系后银行业失去活力

1927—1935年期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官股约占20%，尚未完全被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北伐战争时，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上海银行业为早日建成稳定统一的国家慷慨解囊。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巩固统治，军政所需日益增多，已超出银行承受范围，张嘉璈领导的中国银行与国民政府矛盾日益加深。为使中交两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控制，公布了《修正中国银行条例》和《修正交通银行条例》，大幅增加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官股，将中国银行的官股比例提高到50%，交通银行的官股比例提高到60%。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了中交两行。同时还加强了对商办银行的控制。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全额出资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除了承担中央银行职能，还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1930年3月，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相当于官办储蓄银行。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开业，附属于中央银行，经营信托业务。1933年，为给内战筹措军费，国民政府成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提出“军队开到哪里，机构设到哪里”，到1937年，中国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绝大多数分布在红军长征途中。

伴随着白银风潮，国民政府通过接管中国两大私人银行并创建其他官方银行，控制了“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

央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使银行业逐渐失去活力。私人资本与官方资本之间的比例颠倒过来，私人资本不再主导中国银行业。1936年，中资银行总资产的70%由中央政府银行和25个省、市银行直接控制。

（四）全面抗战时期及战后中资银行的艰难与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后期：1937—1949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支持抗战，中资银行新设数量大幅增加，中资银行的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布局改善（见表3），县域银行体系逐渐形成。1937年以前，中资银行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江浙两省。抗战时期，经济中心和金融机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总办事处，即“四联总处”，成为战时全国金融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政府推动后方各省银行建设，要求各城镇乡市每地至少设立一行。到1943年年底，后方金融网基本形成。

但严酷的环境、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银行业的整体状况恶化。正如杨荫溥^①写到：“银行资力之来源，虽属多端……但其主要来源，则端赖存款……银行业资力于数量上之变迁，可概括得一结论：就表面数字言之，虽似系继续不绝之增加，但就实际力量言之，则近年实有显著之减退……抗战以前之存款递增趋势，虽似并不猛烈，自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之十六七年中，只约增八倍，但此项八倍之增加，确表示银行业于此期内实际资力之进展。抗战以来之十年中，银行存款虽似已约增一千两百倍，但银行实际资力，则反已大为减退。盖此过去十年中，法币购买力在各都市之低落，平均大致已降低至万分之一左右。由此以为

^① 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文海出版社，1974年。

表2 近代中资银行的成长 (1897—1936年) (单位:千元,%)

年份	资本总额		资本实力		总资产	
	量	指数	量	指数	量	指数
1897	3500	10	7518	39	7894	39
1911	35106	100	191768	100	201356	100
1921	142765	406	956203	499	938152	466
1926	163813	466	1606501	838	1599315	840
1931	221916	632	2908370	1517	2885728	1433
1936	402696	1146	7024150	3663	7275890	3613
年均增长率		10.2		15.5		15.4

资料来源:程麟荪(2021)

表3 中资银行地域分布和数量变化

地域	1936年				1946年			
	总行数量(家)	所占比例(%)	分行数量(家)	所占比例(%)	总行数量(家)	所占比例(%)	分行数量(家)	所占比例(%)
上海	58	37.67	124	9.54	83	14.15	190	6.34
重庆	9	5.84	17	1.30	37	6.52	110	3.66
五大都市	23	14.94	210	16.15	21	3.65	312	10.42
江浙两省	36	23.38	300	23.09	30	5.22	308	10.28
西南五省	8	5.18	96	7.4	190	33.10	843	28.14
西北五省	4	2.60	65	5.04	69	12.01	295	9.84
华北五省	7	4.53	196	15.08	65	11.32	134	4.48
华中华南六省	9	5.84	258	19.86	76	13.23	767	25.6
东北及台湾	-	-	33	2.54	3	0.52	37	1.24
合计	154	100	1299	100	574	100	2996	100

资料来源:燕红忠(2012)

推算,则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已增加一千两百倍之银行存款,以购买力论,实已只合二十六年底存款百分之十二。换言之,即全部银行实际资本,十年间减退约达百分之八十八”。同时,存款的期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平均言之,当时一般银行存款中活期与定期之百分比,大致活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定期可能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最近十年来,则定期成分锐减,百分之九十以上均为活期”,从而大大制约了银行运用资金的能力。

三、具有代表性的九家重要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是实力最强的两家中资银行,两行也大力扶持其他中资银行发展。有的中资银行更靠近中国银行,如“南三行”。有的更靠近交通银行,如“北四行”。相较而言,中国银行资本更强,所发钞票信誉更好,是当时中资银行的中流砥柱。根据1935年的数据,在156家中资银行中,28家重要银行积累了约66%的资本,吸收了87%的存款,提供了85%的贷款,占中资银行总资产的84%。其中,中交两行、“北四行”和“南三行”

资本占比26%,存款、资本、贷款和总资产占比均超过一半(见表4)。适中的市场集中度有助于抵御风险,从世界银行发展史来看,欧美和日本的银行都经历过集中度逐渐提升的整合过程。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中资银行,也是中国唯一持续经营超过百年的银行,从诞生之初其实力长期雄居银行界榜首。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户部入股半数,其余招募私人入股(仅限中国人),兼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性质。后由于户部改名为度支部,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股份仍为官商各半认购。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在近代历史上,中国银行的职能发生了三次变化:1912年至1928年,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1928年改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42年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成为国际汇兑银行是中国银行发展历史上的转折点。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努力把中国银行办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以经营外汇业务为发展方向,与多家国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并力争在国外多设机构。1929年成立了伦敦分理处,这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向世界金融中心的开始。同时努力争取存款,扶持工

表4 中资银行的市场集中度 (1935年) (单位:千元,%)

	所有银行	28家银行	28家银行占比	9家重要银行	9家重要银行占比
资本	369619	244314	66	96507	26
存款	3789378	3299007	87	2184770	58
发钞额	1032571	764383	74	467071	45
资本实力	5350280	4447740	83	2748348	51
总资产	5441185	4583484	84	2954180	54
贷款	3195599	2706109	85	1981735	62

资料来源:程麟荪(2021)

商业。中国银行在动荡的时局中始终坚持契合时代需求的变革,管理体制引领了同业效仿,发行的纸钞是中国近代信用最坚挺的纸币之一,并大力扶持同业,与同业密切合作,是近代中资银行界的中流砥柱和领军银行。

交通银行。1908年,清政府邮传部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邮传部出资200万两,为最大股东,其余300万两招商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目的是振兴轮船、铁路、电报、邮政事业,避免依赖外债,挽回利权,尤其为从比利时承包商手中赎回京汉铁路筹措资金。交通银行初期为经营四政往来的专业银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货币业务。1928年,国民政府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1928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到上海。1958年,交通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7年重组后的交通银行开始营业。

盐业银行。1915年3月,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创立盐业银行,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盐业银行成立之初为经营盐业的专业银行,实行官商合办。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总经理改由曾任中国银行监督的吴鼎昌担任,盐业银行改为商办银行,实力日渐雄厚。恒源、裕元等纱厂,宝兴、中原等煤矿公司,京沪、京汉、陇海等铁路建设,北京电灯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公共事业均有盐业银行的注资。吴鼎昌曾长期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并积极推动和促成了“北四行”联营。他呼吁:“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

助实业。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转至天津,1934年迁至上海。抗战期间,该行大楼被日军强占作营房。抗战胜利后,盐业银行业务日益萎缩。1952年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金城银行^①。1917年5月,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由周作民创办并任总经理,以对工商业的贷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周作民认为“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工商业发达,银行才可能发达。金城银行投资了100多家企业,涉及纺织、化工、面粉、煤矿、食品、印刷、建筑、机电、铁路交通等多个领域。为支持永利化学公司试制洋碱,曾单独放款60万元,使其“红三角”牌纯碱进入国际市场。1936年,金城银行存款总额上升为1.8亿元,一度居全国私营银行首位,同年总行迁往上海。抗战时期,金城银行总行在上海租界继续营业,但从此发展缓慢。1952年金城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一批回归大陆的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1951年担任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的董事长,1952年担任全国统一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副董事长。

大陆银行^②。1919年4月,大陆银行由谈荔孙、许汉卿等人共同注资组建。总行在天津,总管理处设在北京,时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兼任董事长。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并兼办信托、保管、仓库等服务。该行存款多数来源于个人,工商业及对外贸易次之;放款以工业放款占多数,商业及对外贸易次之;工业中与化学染料、水泥等工厂较密切,商业中与五金电料及进出口贸易等商家较密切。该行仓库业务在各家银行中也独具特色,为保障抵押贷款,在天津、汉口、上海建立了多处大型仓库,

①“金城”一词含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

②“大陆”一词含发展于东亚大陆之意。

表5 重要中资银行的工业贷款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1926年		1931年		1934年	
	金额	指数	金额	指数	金额	指数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3608	100	23000	637	37097	1028
金城银行	13335	100	30840	232	62499	468
浙江兴业银行	5023	100	10300	205	19188	382
中国银行	15854	100	33675	212	54574	344
合计	37820	100	97815	259	173358	458
银行名称	1930年		1933年		1936年	
	金额	指数	金额	指数	金额	指数
浙江实业银行	4729	100	5653	120	13307	281
中南银行	5948	-	9072	153	15930	268
大陆银行	-	-	3820	100	4219	110
盐业银行	10257	100	8272	81	11023	107

资料来源:程麟赫(2021)

以此取得了对外资银行出口贸易业务的竞争优势。1936年,大陆银行存款额为1.22亿元,居全国私营银行第三位,同年总行迁往上海。1952年大陆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中南银行^①。1921年7月,中南银行在上海开业,由南洋华侨资本创办,发起人是爪哇侨商黄奕住、胡笔江、史量才等,胡笔江任总经理。它是近代海外华侨投资创办的最大银行,主营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属于特批发钞银行,后陆续开办外汇及信托证券业务。中南银行对工商各界放贷大量资金,对工业的投资和放贷尤为显著,而在工业中又以棉纺织业为重点。中南银行注重侨汇事业的发展,号召华侨回国投资。总行设在上海的中南银行之所以属于北四行,是因为与盐业、金城、大陆三行组成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抗战期间,中南银行元气大伤。1952年大陆的中南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2001年,中南银行香港分行并入中银香港。

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杭州,由浙江铁路公司设立并为最大股东。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改革,把行政和业务中心移到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总行,同时改为董事会负责制,叶景葵任董事长。叶景葵曾在大清银行推行许多改革。在他的管理下,浙兴银行的储蓄存款从1915年的438.5万元上升到1926年的3312.1万元。浙江兴业银行强调振兴实业,关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浙兴银行在发展中后期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老上海的金融界中,浙兴的房地产业务做得很大,到20

世纪40年代末,拥有近1000幢房屋。1937年以后,由于日寇的轰炸,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几乎全部覆灭,浙兴银行的工业贷款大都成了坏账。抗战胜利后,由于货币发行激增,贬值速度急剧增加,给浙兴银行带来严重打击。1952年浙兴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陈光甫在上海创办并任总经理,实收资本不到7万元,被称为“小小银行”,而该行发展之迅速却首屈一指。由于经营得法,善于创新,1946年该行资本金增至1000万元,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37年的近2亿元。陈光甫非常重视民众存款业务,1917年设立储蓄专部,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储蓄业务,开创了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多种储蓄形式,还在学校中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蓄,在居民中开办婴儿储蓄,在机关商号中开办节俭储蓄、养老储蓄、礼券储蓄等。1918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了国外汇兑处,开办外汇业务。到192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通汇处遍布国外许多重要都市、商埠,成为我国私营银行办理外汇的先驱。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展,上海总行的国外汇兑处改为国外部,除经营出口押汇、吸收侨汇、发行旅行汇信等业务外,还办理外币存放款业务。1952年,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1950年,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港注册,经营至今。1954年陈光甫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开始营业。

①“中南”一词含中国与南洋合作之意。

浙江实业银行。1908年，清政府为缓解浙江财政危机设立浙江官钱局，政府出全部资本，并找专业的民间人士进行管理，政府只起监督职责，不干涉具体事务。其主要业务为发行可兑现钞票、汇解公款、存放款等。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多，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代理国库，总行在杭州，官商各占一半股份。1914年以后，代理国库功能交由中国银行。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16年李铭和陈朵如对内部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商股权力不断扩大。1923年，官商股分离。杭州、海门、兰溪三行归官股，改名为浙江地方银行。上海、汉口两行归商股，改名为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搬到上海，李铭任总经理，从此日渐兴隆。浙江实业银行主攻中国贸易融资业务。1948年更名为浙江第一银行。1952年大陆的浙江第一银行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陈朵如任公私合营银行的副董事长、总管理处副总经理，1957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1950年，李铭在香港设立浙江第一银行，2004年，该行被并入香港永亨银行。

四、中资银行的业务发展

（一）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是中资银行赖以发展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动荡的时局下，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非常艰难，风险巨大，但中资银行仍尽可能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支持。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中国的经济就无法发展，银行的业务就无法繁荣。随着工业的扩张，中资银行的工业贷款也迅速发展。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业贷款稳居前列。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为281万元，1926年增至1333万元。这一时期浙江兴业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例基本都超过4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的放款余额为360余万元，其中工业放款占20%，加上商业放款，则占到75%。1934年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的工业贷款是1926年的三四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增长达十倍。如果没有这些银行的支持，近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许多大型制造业

企业几乎难以生存。

大多中资银行的工业贷款集中在纺织业、面粉业、化学工业等中国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少数产业。1932年，中国银行提供了3800万元的工业贷款，其中对纺织业的贷款占6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向纺织业提供的贷款占该行工业贷款的61%，浙江兴业银行对纺织业的贷款占该行工业贷款的65%，金城银行对纺织业的贷款占该行工业贷款的一半以上。

（二）多元化是中资银行经营的重要特征

多元化经营是民国时期很多商业银行的选择，可以增加利润来源，分散风险。中资银行既向工商企业贷款，也会直接投资。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环境中，这样的产融结合方式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那些曾留学海外的银行家们看到摩根、三井等财团的蓬勃发展，也想在国内打造多元的银行控股集团。为保信贷安全，大陆银行采取了类似日本主办银行的制度。再如，化学工业在近代属于新兴行业，行业发展前景不明，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屡次力排众议，先后贷款200万余元，帮助国内第一家民办制碱公司——永利制碱多次渡过资金难关，支持其攻克技术难关，研发出新产品，打破了洋碱对国内市场的垄断。金城银行还入股永利制碱的母公司永久黄集团。“北四行”联合直接投资的实业包括久大精盐公司、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天津恒源纺织公司、大公报、南洋企业公司等。“北四行”联合投资建造了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成为各界名流汇集之地。其联合投资的房地产还包括虹口公寓、四行仓库等。李铭创办了杭州电力公司、鼎鑫纱厂、中国工业投资公司等企业。陈光甫是我国旅游业创始人。1923年8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这是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开始，1927年“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更名为“中国旅行社”。

同时，中资银行还纷纷创办保险公司，这是当时中资银行参与保险业务最重要的途径。1926年中南、交通、国华、东莱等银行在上海创办安平保险公司。192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成立了大华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在上海独资创办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这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身。1931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创办中国保险公司，这是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1933年四明银行创办四明保险公司。同年，聚兴诚银行独资创办了兴华保险公司。

（三）同业密切合作是特殊时期的常态

混乱的时局，加上当时中央银行制度的缺失，中资银行在动荡岁月中相互扶持，对促进发展、共同抵御风险、稳定金融市场非常重要。

中国银行大力扶持其他中资银行发展，并主导推动多地银行公会的成立。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只筹到7万元资金，中国银行为了支持其发展，在该行开立了5万元的账户，且一直未动。中国银行对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的发展都尽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同业的帮助。中国银行在1916年“抗停兑令”事件中，在1917年推出《新则例》大力扩充商股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都积极支持并购买了中国银行的股票，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积极作用。1915年7月，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首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南三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高管在上海形成了“银行业午餐会”沟通机制，每周以餐叙的形式交流信息。在此基础上，1918年7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聚兴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广东银行、金城银行加入，首批会员银行12家。首任正副会长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到1949年，共有会员147家。北京银行公会成立于1919年，公会第一届董事长是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继任者是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1923年公会董事长是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天津银行公会成立于1920年，董事长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寿孙。

“北四行”联营。“北四行”联合经营是个创新，对四行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1921年在上海成立联营事务所。1922年大陆银行加入，组成著名的四行联营。四行联营事务所相继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

行纸钞，四家银行联合发行，信用良好，到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总额仅次于中国银行，名列中资银行第二位。四行储蓄会积极吸收社会存款，进行联合放款和直接投资。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对企业和市场进行调查研究，为开展业务提供基础支撑，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南三行”密切合作。“南三行”虽未成立专门的联营机构，但通过联合放款、联合投资、相互开户、相互代理、董监事相互兼任等形式，加强彼此实际联系，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也起到了联合经营的效果。

五、抱持经世济民思想的民族银行家们

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对银行业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变了传统金融体系保守、封闭的局面，形成了创新与开放的金融新格局。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在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方面领先于其他行业，近代银行家在业务中运用新型公司治理架构和新技术上也领先于其他商业领域的领导者。这些银行家基本都长期执掌这些最重要的中资银行，对这些银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当时的银行家们仍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但也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见表6）。

第一，多为江浙人士。江浙自古经济文化发达，素有重商传统。江浙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有很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金融业，他们集中了中国主要的金融资源。江浙商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通过同学、同乡、同事等关系促进了彼此合作与信任，也促进了实力的壮大。由此产生了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富有现代金融知识的专业团体，在很多银行身居要职。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大陆银行的谈荔孙，中南银行的胡笔江是同学，同事，或同乡。李铭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与徐寄庾、陈朵如等是同学。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被称为金融界“四大名旦”。

第二，多有中西方教育背景。中国的首批银行家都有过中国传统教育背景，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有不少还留学海外，其中日本最多，其次是英国、美国。胡笔江和叶景葵虽没有留学经历，但在中国

表6 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

所在银行	银行家	籍贯	职业经历	教育情况	
				国外	中国
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创办者）	江苏常州	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创办了众多领域的实业企业		
中国银行	宋汉章（上海分行经理）	浙江余姚	曾任职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		上海正中书院
	张嘉璈（总经理）	江苏宝山	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总裁	日本	私塾、北京高等工业学堂
	贝祖诒（副总经理）	江苏苏州	曾任中国银行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		唐山交通大学
交通银行	钱新之（董事长）	浙江吴兴	曾任职南京高等商业学校、上海都督府财政部等	日本	育才学堂、北洋大学
	胡祖同（总经理）	浙江鄞县	曾参与创办中国企业银行	英国	
盐业银行	吴鼎昌（总经理）	浙江吴兴	曾任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	日本	成都尊经书院
金城银行	周作民（总经理）	江苏淮安	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交通银行等	日本	私塾、东文学堂、广东公学
大陆银行	谈荔孙（董事长）	江苏淮安	曾任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	日本	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中南银行	黄奕住（董事长）	福建南安	印尼著名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私塾
	胡笔江（总经理）	江苏江都	曾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		私塾
浙江兴业银行	叶景葵（董事长）	浙江杭州	曾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大清银行监督等职		进士
	徐寄庠（董事长）	浙江永嘉	先后任中国银行兰溪、九江分行经理等职	日本	杭州高等师范学堂
	徐新六（董事长）	浙江余杭	曾任职北洋政府财政部、北京大学、中国银行等	英国、法国	南洋公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总经理）	江苏镇江	曾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江苏银行总经理	美国	私塾
浙江实业银行	李铭（董事长）	浙江绍兴	曾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日本	私塾、教会中学
	陈朵如（总经理）	浙江萧山	曾任中国银行兰溪支行经理	日本	私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因为任职有先后，所以同一家银行同一职位有时会出现两位以上人士。

接受过几年西方文化教育。中西方教育背景的结合对这些银行家推动中资银行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银行家了解西方技术的先进性，又精通中国社会和文化，并在经营中保持与外国公司的合作和接触。

第三，经世济民是这些银行家投身银行业的初心。儒家思想强调高尚的人有责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改变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轻视商业的看法，积极投身于工商企业经营。这些银行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只有成为经济强国，才能与外国竞争。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社会责任，认为兴办实业和金融业是民族振兴的重要路径。中国银行总

经理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提出“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的企业精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说：“世界之大势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银行和每一个员工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拯救中国’。因此，银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中国的生产，‘抵制外人经济压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认为，“银行事业，完全是为国家为社会的事业，办银行的当局，以保守信用为最要紧，绝不是为股东抱发财计划，也绝不是为职员谋发财计划。”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倪远甫强调，“银行固须赖实业之进步而

始发达”“方今世变日亟，民生憔悴，识者皆知振兴工商为苏困弥乱根本……”。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坚守民族气节。尽管许多银行家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友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抗日战争期间，没有一位重要银行家与日本合作，或间接接受伪政权职位。张嘉璈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后，“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为支持抗战，出任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部长，“一则可以贯彻在中行时代所抱辅助铁道建设之志愿，二则希望实行中山先生建筑十万里铁路之大计划”。1938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被国民政府内定为出国争取外援的代表，从香港飞重庆途中被日军得知消息后击落飞机遇难。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香港被日军软禁，仍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因拒绝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要求，遭汉奸特务绑架，被勒索巨款，仍持不合作态度，还曾筹款慰问抗日前线将士，并多次从浙江实业银行的暗账中，拨款支持中共秘密组织。抗战爆发后，中南银行董事长黄奕住拒绝加入外国籍来保全生命和财产，誓与国家共存亡，并登报通知所有储户不论定活期，即日可前往该行领取存款本息，在民族危难之际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被日伪政府通缉，秘密前往美国，成为中美经贸交流的“银行使者”，并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五，与权力共舞和历史的终结。伴随商业银行官办化浪潮，曾经起核心作用、不愿顺从国民政府意图的银行上层人士相继被揽入政府部门任职，或出任或兼任官办化银行职位，或被迫退出银行界，成为半官方或社会贤达等人物。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基本消失了。1935年是与权力共舞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银行业也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有的甚至走上囤积居奇、投机外汇等不正常的道路。

张嘉璈写道：“自抗拒袁世凯停兑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抗衡。以中国银行之奋斗经过，推及于民国以来之政治演变，若能早有巩固

统一之政府，有完善健全之法律、公共机关，使主持其事者久于其位，在民间私人企业，任其自由发展，则一切循天演公例，努力推进，何事不可追步欧美，甚或后来居上。”

从中资银行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都是举步维艰的。这些民族银行家的坚守信仰和家国情怀，这些中资银行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开放，对近代经济和现代银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金融要始终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 [1] 曹潇．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1927—1937）[D]．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 [2] 程麟荪．近代中国的银行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3] 姜建清、蒋立场．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 [4] 交通银行史编委会．交通银行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
- [5] 兰日旭．近代银行中的保险业务[J]．中国金融，2014(6)：89—90
- [6]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四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7] 吴景平．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与政商关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1)：5—12
- [8] 燕红忠．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9] 燕红忠．中国金融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 [10]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M]．上海：商务出版社，1930
- [11] 姚遂．中国金融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12] 易棉阳．早期华资银行业研究（1897—1927年）[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 [13]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近代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及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影响研究[J]．华北金融，2020(6)：86—94
- [14]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辛本胜）